



评鲍德里亚对时尚的后现代主义阐释

王晓升

〔摘要〕鲍德里亚认为,只有当符号没有确定意义的时候,即当符号从固定意义中解放出来的时候,时尚才会出现。而这是在现代社会才发生的。时尚的现代性表明,时尚必须是求新、求变的,而求新、求变的时尚也有一种复古和回溯的趋势。但是,这种复古只是形式的再现、复活。这表明时尚有一种“类似自杀的倾向”。具有后现代倾向的时尚是取消意义的纯粹形式特点。这种纯形式变化以直接社会性为目标。时尚符号甚至会扩展到人的身体,使人的身体变成纯粹的符号,成为人的新的“性”特征。时尚的纯形式变化表明,符号的结构意义被解构了,它具有颠覆性意义,这与社会的结构被颠覆类似。

〔关键词〕时尚;现代性;符号;后现代主义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王晓升,1962年生,哲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4)。

〔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3)03-0005-06

时尚是我们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却很少受到哲学家的重视,很少成为哲学家思考的对象。而鲍德里亚从社会批判的维度对时尚进行了深入的、具有深刻哲学意义的分析。这一分析不仅对于我们更好地从哲学上理解时尚,而且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他的仿像(simulacra)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时尚与现代性

某种生活方式或者衣着模式流行开来了,成为一种时尚(fashion)。一种东西被人模仿才成为时尚。而模仿的东西就不是时尚了,那叫赶时髦。然而,如果没有赶时髦,时尚也就体现不出来。所以时尚总是与时尚的模仿(simulation)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仿像就没有时尚。我们中国人在日常语言中也把时尚说成是“时髦”(modern)。这种说法是有历史根据的。因为,时尚是在现代社会才出现的现象,时尚是现代性的产物。

鲍德里亚按照仿像的三个等级的模式来解释时尚。他认为,在封建社会中,符号是按照等级制度被规定的,符号是有限制的,其含义是清晰的。因此,在那个时代,人们的衣着虽然也可以被理解为符号,但是,每种衣着都有固定的含义,是用来规定人的等级的。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这些都是

“强制符号”。人们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随意选择衣服。因此,那个时代的衣服是没有时装的意思的。在那个时代,人们有礼仪和礼仪中规定的装束。在礼仪中,所有的人的行动方式都是被规定的,都是强制的符号,因此这些行动也没有时髦与否的问题。在礼仪中,一个人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着装,不能追求时髦。因此在礼仪中,不可能有时尚。而时尚是随着文艺复兴时期而兴起的。^{〔1〕}在这个时代,符号获得了解放,所有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自由地玩弄符号。可以说,时尚是随意玩弄符号的产物。文艺复兴时代的时尚是第一级仿像,是对原型的模仿。这个时代的时尚是通过仿造形成的。比如仿大理石的装饰是那个时代的时尚。为此,鲍德里亚说“仿大理石是一切人造符号的辉煌民主,是戏剧和时尚的顶峰。”^{〔2〕}而工业革命的时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个时候,没有可以模仿的原型了,而只有同样东西的复制。大量的、可以批量生产的东西是那个时代人们追捧的时尚。这种时尚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到处可见,比如,我们许多人家里的装潢就是使用了大量的可以批量生产的东西。同时,家庭中的装饰还是与它的使用价值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在这个时候时尚还是有所指的。如果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符号不仅是能指符号,而且还有所指,包含了一定的意义。不过,鲍德里亚认为,这样



一种时代是规模较小的时代。(3)而在后现代社会(即鲍德里亚所说的生产终结了的社会)中,时尚不是仿造出来的,也不是批量生产出来的,而往往是没有使用价值的纯粹符号。或者说,这个时候的符号是纯粹的“漂浮的能指”。人们就是要制造某些纯粹的差异符号。用鲍德里亚自己的话来说:“能指的简单差异游戏在时尚中加速,并变得非常明显,以致最终使我们着迷——这是对失去一切参照的(符号)系统的着迷和眩晕。”①比如,人们穿牛仔裤是一种时尚,把牛仔裤上挖个洞也是时尚。牛仔裤和挖了一个洞的牛仔裤之间只有形式的差别,是纯粹的差异符号。

鲍德里亚把时尚与现代性联系起来,强调只有在现时代时尚才会出现。时尚就是要求新、求异、求变。现代性的主要标志就是决裂、进步和更新。时尚与现代性的特点是一致的。现代性的进步观是一种线性的进步观,这种线性的进步观在启蒙时代和工业时代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是线性的时间维度。鲍德里亚认为,工业时代之后的现代性(后现代)则不同了。人们看到现代性中的倒退,看到了现代性中的危机。在这里的现代性中出现了一个循环的时间维度,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后现代性。鲍德里亚不用“后现代”这个词,其分析的思路是后现代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赞同凯尔纳的观点。鲍德里亚认为现代性似乎同时设置了一种线性时间和一种循环时间。按照他对于现代性的这种理解,他认为,“现代性永远既是新生的,也是追溯的,既是现代的,又是过时的”(4)。于是,启蒙和工业革命之后的时尚就有了新的特点。这种新时尚也与新的现代性(后现代)的特性是一致的。这种新的时尚具有循环性。或者说,过时的东西会被纳入时尚之中。在工业革命的时代,时尚是与使用价值的生产联系在一起。而后现代时尚不考虑使用价值,它越来越成为纯粹的符号。在这种情况下,时尚品的价格不是按照生产中所投入的劳动来计算的,而是按照流行的趋势来确定的。由此,鲍德里亚说“时尚是政治经济学的完成形式,是消除商品线性的循环。”(5)

二、时尚是无意义的符号游戏

既然时尚既是现代的,又是过去的,既包含了线性的时间,又包含了循环性的时间,那么时尚就

会表现出现代和复古并存的情况。比如,在一个全新的现代装饰的酒店中会有一件仿古工艺品。鲍德里亚说“时尚总是复古的,但它建立在取消过去的基础上:这是形式的死亡和形式幽灵般地的复活。”(6)显然,在酒店的现代性氛围中,过去被取消了,传统的东西以新的形式出现了。不仅如此,时尚常常是新旧形式的不断轮回。新形式不断产生也不断被淘汰,而旧形式在新背景中出现。新旧不断循环。时尚领域常常表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景观。一种新东西刚刚出现,就被其他东西所取代。时尚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鲍德里亚说,时尚“有一种类似自杀的欲望”(7)。当然,鲍德里亚觉得这样的说法不够准确。他认为,这种自杀也不是彻底的灭绝,而是一种循环性再生。过去的时尚被人们在新的情况下又乔装打扮重新进入时尚。这就如同人们看到的,一会儿长裙成为时尚,一会儿短裙成为时尚。于是,他说“我的意思是,死亡的欲望在时尚中重新处理过了,其全部颠覆性的幻觉被掏空了,并把这种欲望与其他所有东西一起卷入时尚的无害性的革命中。”②时尚总是在不断地自我更新,不断地革命。它似乎有一种“自杀的欲望”,但是这种“自杀”不是彻底消除时尚,彻底颠覆时尚,而是要使时尚不断地自我循环。时尚所追求的是为新奇而新奇,而这种新奇之中不包含任何目的。在康德那里,这被称为“无目的的目的性”。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鲍德里亚看来,时尚与博物馆类似。博物馆也是各种物品(类似于符号)的纯粹排列,是纯形式的排列和组合。博物馆不仅要把过去的东西记录下来,而且不断地要让它们复活。比如,博物馆中的某些东西成为旅游纪念品,而这些旅游纪念品就成为家庭中的小装饰,成为生活中的时尚。时尚的东西也是新与旧的混合。所以,鲍德里亚说“时尚和博物馆是同时代的,它们是同谋。它们共同对抗以前的所有文化(即启蒙运动之前的文化——引者注)。”(8)

在鲍德里亚看来,时尚就像代码。时尚的形成就是各种代码的结合。而在各种代码的结合中,人们会形成有意义的句子。而时尚作为代码的结合,是无意义的,它不表达任何意义,就是纯形式的。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在时尚中,意义的消解更为彻底。”(9)比如,在一般商品买卖的意义上,人们

①② 参见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25、128页。



购买衣服是为了保暖,是为了表明自己是男性或女性。但是,在时尚中,购买衣服与保暖的需要无关。在这里,时装所追求的是纯形式的视觉冲击。当然有时,时尚的东西似乎也会显示出某种目的性,但是在鲍德里亚看来,这种目的性不过是一种仿真现象,是一种“无目的的目的性”。时尚在这里所取得的是审美(感性的)效果。为此,鲍德里亚说:“我们的时尚是表演,是以审美方式自我重叠、自我满足的社会性,是为了变化而变化的游戏。”⁽¹⁰⁾比如,如果人们把自己的牛仔裤的臀部挖个洞,那么这个洞就与其他牛仔裤在形式上不同了。其他人可能在这个部位加上一个补丁。这是纯形式的变化(与性无关)。但是,这种纯形式的变化却产生了一种视觉冲击。而这种视觉冲击就是赶时髦的人所期待的。他从这种视觉冲击中获得了快感。这个时候,时尚就像舞台上的表演,表演引起别人的注意,表演者从这里获得了感性的快乐(aesthetic pleasure,也被翻译为“审美快感”)。

在鲍德里亚看来,时尚是我们的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我们的一切生活都是时尚意义上的生活。任何人都无法摆脱时尚。他指出,关于时尚有两种偏见,一种是把时尚扩展到人类学边缘,甚至扩展到动物行为,一种是把时尚局限在时装和外部符号。⁽¹¹⁾他的意思无非就是,除了动物没有时尚外,凡是人,即便是儿童和老人,都无法避免时尚的生活方式。时尚也不能被局限在时装等外部的符号上。动物没有时尚行为,人类对待动物行为越来越成为一种时尚。养狗的人从表面看是爱护动物,实际上是把动物的饲养当成了生活时尚的符号,成为时尚的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时尚不是局限在时装上的,也不是局限在外部符号上的,它深入了人的思想中,构成了人的行为方式。

时尚与社会性联系在一起。人具有追求时尚的欲望,鲍德里亚把这种欲望称为“时尚的冲动”,“这种冲动就是废除意义、投入纯粹的符号、走向野蛮的直接社会性的欲望”⁽¹²⁾。这种时尚的欲望不是对于美好东西的追求,而是对于新奇和时髦的东西的追求。这种追求时髦东西的欲望非常强烈。其强烈的程度一点也不比追求爱情和野心低。只不过追求爱情和权力的野心在生活中更重要,而时尚所追求的东西在生活中却是微不足道的。时尚冲动的目标不过是一些差异符号。而这种微不足道的差异符号为什么会让人产生如此强烈的欲望

呢?这就是对于“野蛮的直接社会性的欲望”。差异符号让人产生印象,能够“吸引眼球”。时尚的冲动实际上就是对于直接社会性的需要。

时尚能够产生直接的社会性。鲍德里亚说:“时尚和语言一样,一开始针对的就是社会性。”⁽¹³⁾人们使用语言是为了相互交流。人们追求时尚是为了引人注目,正所谓“戏剧社会性”。追求时尚的人从这种瞩目中获得一种快感,并对自身感到满意。有些模特就是要通过这种所谓的时尚而引人注目,并由此而获得快感。这种时尚追求与美、丑无关。鲍德里亚说“时尚和追求交流的语言相反,它玩弄交流,把交流变为一种无信息的意指,一种无目的的赌注,并产生一种与美丑无关的审美快乐。”^①既然时尚所追求的是戏剧社会性,那么时尚就类似于一个人的自我表演。就如同一个人在舞台上演戏。所以时尚的生活也是一种自我表演的生活,是自我游戏。本来,时尚就是各种差异符号的会聚,没有意义,但是时尚的表演就是要使无意义的东西产生意义。时尚之所以对许多人有如此大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凭空把意义生产出来。本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衣服主要为实用目的而生产出来的,但是,时尚要使衣服有品位、有风格、有格调、有气质,总之它能够让那些本来无意义的符号产生出各种不同的意义,让许多人趋之若鹜。这是一种集体的表演和狂欢。在这里,人们获得了集体的快感。

时尚有传染性,会导致许多人的模仿,这种模仿便成为“赶时髦”。有某种品牌的名包,就有就有模仿这种品牌的仿名包。当模仿成为习惯的时候,模仿的东西和真东西之间的界限就消失了。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仿真(simulacrum)。时尚的生活就是仿真的生活。在这种仿真生活中,人们所购买的商品实际上只有符号的意义,但是它却使人误以为他们所购买的是实用品。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政治家和模特一样,也是追求时尚的人。他们也要通过符号的操弄而获得社会影响。获得社会影响是追求时尚的唯一目标。那些在街头演说的日本政客,就是在进行这类似的符号操作。他们在说话,但是他们却在玩弄交流。那些学术精英也越来越开始追求时尚。鲍德里亚说,科学的普及产生了时尚效果。⁽¹⁴⁾科学的普及在一定的意义上类似于时尚的传染性。在时尚中,人们相互模仿。科学家在传播

① 参见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37页。



科学中,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让科学时尚化。大众传媒也成为学术时尚化的重要工具。在这里,人们玩弄交流。交流的目的不是思想的差别,而是博眼球的表演。于是,学术“明星”出现。他们开始引领时尚。弗洛伊德思想可以简单地套用,马克思的概念可以随意拓展。鲍德里亚说“整个文化领域自我参照。各种概念通过纯粹的思辨相互生成,相互回应,此时除了话语的‘表情’,话语的意义本身也在时尚的影响下崩溃了。”⁽¹⁵⁾无意义、无所指的新概念随意堆砌,造成了差异的视觉效果,给人一种新奇之感。这里出现了一种为创新而创新的学术。实际上,这种新奇和博物馆里的展品一样。赶时髦、赶热闹的学术越来越多,深刻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少。学术刊物也学会赶时髦。如同时装杂志一般,它们不断地公布学术研究的“流行趋势”。学术界已经越来越“耐不住寂寞”了。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这种时髦的学术不过是无意义的符号的堆积。不过它总是让人看起来很有意义。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仿真”效果。比如,中国的许多“联系实际”的大作,看起来非常有意义,实际上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如同博物馆里的东西,不过这些陈词滥调被重新包装了,像是新东西,而实际上就是无意义的符号。这与所有其他的时尚一样,它们具有使无意义产生意义的表演能力。⁽¹⁶⁾

时尚不是按照经济学原则运行的。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时尚是在经济学完成的情况下出现的。这是因为,在经济学中,所有的东西都被纳入到了交换的领域,并按照某种一般等价物进行交换。而时尚则不同。在时尚领域中没有一般等价物。“这是因为,时尚从一开始就处在比政治经济学更形式化的抽象中,它所处的阶段甚至不再需要明显的一般等价物(黄金或货币)。因为从此只有一般等价物的形式继续存在。这就是时尚本身。”⁽¹⁷⁾时尚不是一般等价物,它是一般等价物的形式。一般等价物是包含内容的,是有价值含量的,而时尚没有任何含义,是纯形式的东西。因此,时尚比一般等价物更抽象。既然时尚超越了经济学的原则,因此时尚物品在市场上的买卖就不是按照市场的原则来进行的。它们不是按照市场价格来买卖的。这就如同某些名牌大学的博士学位一样,它是“时装”,是显示差异的符号,没有任何实在的意义。但是其价格却是惊人的。这是因为,这种时装不是按照市场价格来买卖的。时尚消费是一种突破经济原则的奢侈消费。

三、时尚把身体作为中介

时尚是人的行为方式,并且是和人的身体联系在一起。化妆品和衣着这样的时尚用品是以身体为中介的。或者说,它们借助于身体而表现出其时尚特性。鲍德里亚对于时尚和身体的关系的理解在这句话中得到了典型的表达“性特征包围了服装、化妆品,等等,没有比这种看法更不确定的了。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改变了的性特征在时尚层面上发挥作用。”⁽¹⁸⁾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看法,人都有性别上的特征的。化妆品和服装具有性别上的特征。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用来把人的性特征表现出来的。鲍德里亚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人们为了时尚而改变了性特征,或者说,改变人的身体上的性特征成为时尚的一部分。这就是说,一旦人把自己的身体作为时尚的东西呈现出来的时候,人的性别特征就无足轻重了。许多人一定认为,鲍德里亚的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许多人不是把自己的某些性别特征作为时尚来展现的吗?比如,在现代,一些女性把自己的胸部半露出来。这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在这里,鲍德里亚对于身体和时尚关系有另一种理解。

鲍德里亚吸收了巴尔特关于时尚和身体关系的观点。按照巴尔特对于时尚的身体的三种形式的分析,鲍德里亚认为,时装模特的发展有三个历史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时装模特是少数贵妇人。衣服按照贵夫人的身材、面容的状况而设计。在第二阶段,时装按照专业模特的身体模式设计。人的身体需要像模特。而在第三阶段。这就是当前的阶段,所有的人都成为模特,所有的人都按照模特的标准来改变自己的身体。于是人的身体本身就成为类似于时装的东西。原来的美容就是在面部进行化妆。现在的美容要按照标准的美女模式整容。原来,人们穿上时装进行表演,如今身体本身成为时尚,我们可以从裸体不断在传媒中出现而知道这一点。为此,鲍德里亚说“当时尚成为身体的表演时,当身体成为时尚的中介时,时尚就得到了深化。”⁽¹⁹⁾以往,只有穿着漂亮的衣服才时尚,如今,身体的表演本身就是时尚,不穿衣服也时尚。身体是按照时尚的要求设计的。时尚就是表演,身体作为时尚的媒介就要不断地进行时尚表演。于是,以时尚形式表演的身体就是符号化、差异化的身体,而有性别差异的身体不过是时尚表演的媒介。正如符号需要载体一样,时尚也需要载体,这个载体就是身体。于是,鲍德里亚强调,在这里,服





装的游戏就要给身体的游戏让路,而身体游戏最后给模特游戏让路,模特游戏就是我们的身体游戏的极端形式。所有的人都生活中时尚中,都把身体按照模特的方式而时尚化。我们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是模特,都像模特那样把自己的身体时尚化。当身体的动作、身体上的衣服都按照模特的式样时尚化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成为模特。模特的表演只是掩盖了我们作为模特的事实。

鲍德里亚认为,当身体时尚化的时候,身体本身就不是具有性别意义的身体了。身体就成为差异性符号了。时尚本身就变成了“性”。人取得了新的“性”特征。这种性不是生殖意义上的性,不是生理意义上的性,而是时尚意义上的性,纯粹的符号意义上的性。这种性既不能生孩子,也不能相互交媾,而就是符号对立。当裸体出现的时候,裸体作为一种时尚表演出现的时候,是没有生理上性的含义的。当我们看到某个人把自己的性特征表现出来的时候,这个人看起来很“性感”。但是,这种“性”既不是用来生孩子的,也不是用来获得性快感的。但是我们误解了,我们以为,裸体显露出来的性特征才是真正的性。实际上那是虚假的性,是性的仿真。比如,哪些裸露的胸脯是一种时尚的表现形式,是差异符号,是用来吸引眼球而不是生孩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裸露出来的、以表演为目的的时尚符号,与电脑的美女图画没有差别。这些美女图画具有生理上的性的意义吗?没有。这是性的仿真形式,然而我们却把这种仿真形式的性当做真正的性。许多人把这种美女图或者美女模特作为性伙伴的标准。于是,我们生活中最本己的性行为时尚化了。在这里,身体失去了性快感意义上、生育意义上的魅力,或者说,身体失去了性的魅力而成为时尚的载体。为此,鲍德里亚说,“当身体被托付给时尚的符号的时候,就会失去性的魔力,成为模特(modèle)的欲望,这个没有性别意义的词(modèle在法语中是中性词——引者注)将自己要说的意思说得很清楚。”^①

在鲍德里亚看来,原来时装是与女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女性才穿时装。而那个时候穿时装就是要从象征上“隐藏”身体,或者说就是用来压抑人的性需求。后来,随着时尚的普及,时尚已经不是某个性别或者某个年龄阶段的特权。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的身体都成为时尚符号,都按照模特的样子来保持体形,进行整容,学会走猫步。时尚已

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全面铺开。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的身体变成时尚的符号,变成没有生理上的性特征的符号。或者说,人的生理性行为都是按照时尚形式调整的。于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鲍德里亚认为,“整个社会开始女性化了”(20)。所有人都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了时尚符号。人的自然的性特征是按照时尚的方式被整合的,变成了时尚中的符号。如果说在历史上,时尚只是局限在某些人特别是女性的生活中,那么现在时尚已经打破了这种限制,而扩展到所有人的生活中。如果说以往时尚是要隐藏身体,特别是女性身体的,而如今,身体本身变成了时尚。于是,在现代社会的时尚中,女性获得了解放,就是女性的身体作为时尚符号获得了解放。在鲍德里亚看来,这不是妇女解放,而是“女性的身体”作为象征符号的解放。在这里,“女人只能作为‘快乐力’和‘时尚力’得到解放和自由,如同无产者从来只是作为‘劳动力’得到解放和自由”^②。这就是说,在现代时尚社会中,女性得到了解放,这种解放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女性可以把自己的身体作为时尚符号显示出来。穿得越少似乎就越时髦。在这种时髦的解放中,妇女不过是自己当成了男人的玩物,给男人带来“性快乐”和“性想像”的玩物。或者,男人把女人看做是带来快乐的符号。这就如同资产阶级要把无产者解放出来。不过在这种解放中,他们使无产者成为永远的“劳动者”。现代社会中的女性所受到的压迫是这种符号性的压迫。女性必须把自己的身体作为性感的符号展现出来。这是时尚。她们的身体就是这种时尚的表现。女性把自己的胸脯展现出来就是女性受到这种符号性压迫的表现。女性的身体解放实际上就是女性的受压迫的标记。

四、时尚没有给革命留下位置

鲍德里亚对于现代社会中的时尚的分析特别是对于女性与时尚关系的分析给我们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受到一种符号体系的控制。所有的人都参与这种纯形式的游戏——时尚,并最终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了时尚游戏的一部分。那么人们有什么办法颠覆这种符号控制呢?鲍德里亚给出的答案是,这是不可颠覆的。

在历史上,人们也曾经对时尚进行过批判。按照鲍德里亚的分析,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曾经批判过时尚。右派是保守派,因为在他们看来,时尚

^{①②} 参见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43、144页。



是不道德的。比如,保守主义者会认为,那些袒胸露背的服装,那些透视装,实在是太不道德了,太不守规矩了。而左派也会认为,时装消弭了人们的革命意志,是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情调。在鲍德里亚看来,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的批判都是为了保持以往的秩序,保守派要维持传统的道德秩序,而左派则要保持革命的政治秩序。而鲍德里亚认为,时尚的积极意义就是颠覆了这种秩序。左派和右派之所以认为时尚是不道德的,是因为时尚颠覆了权力结构。用鲍德里亚本人的话来说“它仿佛是权力的地狱,所有符号的相关性构成了这个地狱,任何权力为了保障自己的符号,都必然要砸烂这个地狱。”^[21]这就是说,那些批判时尚的人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

在历史上,人们否定时尚是为了维护权力,而现代社会中人们也试图颠覆时尚。但是,鲍德里亚认为,现代社会中任何颠覆时尚的努力都属于时尚。比如,牛仔裤曾经被用来颠覆时尚的。但是,如今牛仔裤本身成为时尚。在鲍德里亚看来,任何人都无法逃离时尚。所有人都处于时尚中,都是时尚的符号。任何逃离时尚的努力都会返回到时尚中,犹如在麦比乌斯带(Möbius band)中循环。从表面上看,人从麦比乌斯带上走向了反面,但是最

终还是回到了同样一面。在鲍德里亚看来,这是因为,时尚是纯粹的空洞的符号,没有内容。它超越了美与丑、好与坏。对于某种有内容的符号,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符号来对抗它。比如,对于丑的东西,我们可以用美的东西来对抗。但是,时尚作为纯粹的符号超越了这种对抗。于是,“时尚没有给革命留出位置”^[22]。对于时尚,任何革命和反抗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时尚符号不可颠覆,那么 we 有什么办法对付符号的控制呢?这就是对于时尚符号形式的解构,把无意义的时尚符号推向极端。那么怎样做才能解构这种纯形式的符号呢?鲍德里亚没有给出说明。但是,我们似乎感到,某些时尚符号还是有意义的,还是试图指称某些东西,比如名包等时尚产品的有些说明等。我们要做的就是颠覆这些符号的意义,使之彻底无意义。

(参考文献)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68、70、77、129、125、126、127、128、126、130、130、135、137、131、131、136、133、140、141、144、145-146、146页。

【责任编辑:侯小丰】

